

越共黨魁更替與經改難題

羅石圃

越南共黨總書記黎笋，以七十九歲高齡於今（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病故。這位堅持中央集權與統制經濟的黨魁撒手後，照理，越共領導層中力主經濟改革實行地方分權的年輕一代，應該崛起接任黨魁才對。然而在他逝世後的第四天，越共中全會特別會議即選出長征接任總書記。長征亦已屆七九風燭之年，且與黎笋同屬死硬舊派，何以竟亦擔任黨魁？此是否顯示較年輕高幹將放棄經改？抑或長征企圖捨舊從新？這些問題，頗值得深入探索。

（一）越共違背胡志明不可介入中蘇共爭端的遺言

越南共產黨，原先為隱藏面目定名為「勞動黨」，由胡志明一手創立，目標為向法國爭取獨立主權，至日本南侵，由於當時蘇聯爭取與自由國家並肩抗拒「法西斯」侵略，遂由第三國際公開宣佈國際共黨組織取消，使各國共黨一律組成民族統一抗日陣線。越南「民主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即在此種背景下，由胡志明以越共化名的「勞動黨」為基礎，聯合南北越各黨派及宗教團體共同組成^①。

至中共赤化大陸，胡志明以「越盟」及「勞動黨」黨魁的雙重身份，要求北平政權支援其強化對法戰爭，俾便解脫殖民主義

註①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第七章，朱鶴賓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枷鎖，中共以近水樓臺，朝發夕至之便，慨然予以軍經援助，惟要求胡志明必須在反帝反殖民主義鬭爭中，揭舉共黨旗幟，對自由份子不能左轉者即予鬭爭，甚至將此種黨派團體推開，故在抗法戰爭過程中，原先參加「越盟」的黨派及宗教團體紛紛脫離，轉而標榜反法反共，遂使「勞動黨」的共黨猙獰面目暴露無遺②。

其實中共大力哺育越共及支援其抗法戰爭的真正目的，乃在支使越共武鬭奪權，遵循毛澤東炮製的「槍桿子出政權」路線，使東南亞以至全亞洲共黨，都跟從此一路線而遠離蘇聯，俾造成北平與莫斯科分庭抗禮之勢。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國際會議簽訂「越南停戰協定」，法國放棄印支三邦，越南一分爲二，越共佔踞北越，在河內建立赤色政權。蘇聯之所以竭力促成此一協定，除爲共產國際在北越建立赤化東南亞前進基地而外，更含有制止越共跟從中共的武鬭路線，並進而促其遵循莫斯科「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用意③。

胡志明早已窺見中共大力支援越共進行抗法之戰的意圖，故於北越建立赤色政權後，不顧北平的壓力，斷然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俾便引進克宮勢力，平衡中共，避免淪爲北平附庸。不過，繼後中蘇共的「和」「戰」路線歧異由暗鬭化爲明爭時，胡志明則力誠其黨羽，對此「兩大」的爭端斷不可捲入，只能站在超然立場④。至一九六九年，這位被越人所稱的「胡伯伯」逝世，由他一手栽培而成的黎笋接任黨魁，而越共則一步步的倒向克宮懷抱，聽任蘇聯支使，並在揮軍侵略高棉及併吞寮國的過程中，不惜與中共刁兵相見，反目成讎⑤。

(二) 黎笋的武功不能掩盖經濟蕭條

黎笋出任越共黨魁，已有十七年之久，成就得失如何？在表面上，越共在他的領導之下，統一了南北越，並於迫使美軍退出印支三邦後，南侵高棉，併吞寮國，北拒中共，可謂戰功彪炳；不過放眼越南，經過卅多年的戰火蹂躪，到處都是田園淒涼，民生凋敝。在此經濟情況江河日下之際，越共爲平息民怨，曾於上年八月宣佈一連串的經濟改革措施，諸如取消配給制和慣常的津貼，及將工資提高，藉以補償物價上漲的損失。不料因此導致物價飛漲，尤其是白米的漲幅與前年相較，已達五倍以上。

註②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黎世芬著，本刊，第四卷第六期。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北越內幕▼，J P 霍尼博士著，香港燐火社譯印。

註⑤ ▲當前越南關係之評估▼，本刊，第廿一卷第七期，拙著。

由於物價狂漲及管制措施加嚴，更使黑市交易熱絡。據新聞報導：在河內黑市市場上，一碗湯的價錢，在今年三月，已由四盾漲到十盾，而平均每人每月的工資，只有三百到四百盾，大概每天只能喝一碗湯，因而迫使政府不得不恢復若干基本必需品的配給，及再度界予低收入者一些津貼^⑥。在此生活重壓之下，如何改善經濟，在越共幹部之中，便已成爲熱門的爭議。據英國國會代表團於今年四月訪越返英後所提出的報告稱：他們在河內與各方面接觸，所得的印象，是越共領導層之中，年輕的一輩較老一輩更重視越南的經濟問題，急於謀求改善人民的生活。該報告並指出目前越南的外匯儲備，僅在一千六百萬美元上下，該代表團認爲越南的希望，將寄託於越共領導層中的年輕一代^⑦。

越共中央政治局共有十三名委員，平均年齡爲七十四歲，其中與胡志明於一九二九年同建共黨的，佔四分之三。這批老委員都和黎笋一樣，堅持中央集權，嚴格實行統制經濟；而較年輕的如阮文林、武志功等人，則主張仿效東歐國家的地方分權，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作有限度的開放，以吸引國外經商的投資^⑧。這種經濟改革企劃，雖不能獲得老一派的接受，但在南越胡志明市（西貢），則已付諸實施。在該市已有家庭式的小型工廠林立，並接納越僑的投資，除私營及合資經營的工業而外，公營工廠亦裁汰冗員，在生產線上的員工，並可得到百分之五十的獎金。

胡志明市人民委員之一的武鶴花指出：此次改革是由副總理武文傑領導的。他排除了拖累的配給制度，規定要用「社會主義的經濟會計和商業」替代中央計劃，遂形成了南越經濟務實派的成績斐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共在該市實施的經改，不僅使河內的「三合一」制（國營、公營、合作社經營）增加了私營，合資經營而成爲「五合一」制；且採取了有限的開放政策，與「東協」伙伴國大馬、菲律賓、印尼通航，連堅持以經貿制裁越南的泰國工商界，亦有不少人企圖開闢此一市場。誠然，南越不顧河內老幹部所堅持的中央集權統制經濟，斷然實施經改，並造成生氣盎然，肩負此一重任者，自不止武文傑一人，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專任南越黨政督導的阮文林及原「南解」負責人現任內務部長的范雄，也都大有貢獻^⑨。

黎笋正在此種情形下逝世，其所遺總書記一職，一般多認爲正是越共領導層中青年人接棒的時機，而武文傑、阮文林、范雄等，亦正是接替總書記的適當人選。然而越共中全會特別會議竟選出與黎同年齡、同立場的長征，接替總書記且仍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原因何在？

註⑥ △越南內部危機重重▽，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六、三、廿三，二版，李學明著。

註⑦ △越南統治階層醞釀變化▽，香港《星島日報》，二版，社論。

註⑧ △越共老人班子的異動▽，臺北《中國時報》，一版，「國際瞭望欄」。

註⑨ △南越經濟務實成績斐然▽，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四、廿四，十版，「世說」欄。

(三) 長征地位起落的幕後來由

長征是胡志明創立越南共黨時的同伴之一，在越共老人班之中，是死硬派巨頭之一，作為越共掩體的「勞動黨」，其首任總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就是長征，排名僅次於胡志明，至一九五四年越共在河內建立政權後，他堅主厲行農業集體化政策，以致十萬人送入「勞改營」，五萬人被處決，土地均被沒收。繼後由於忿激的農民羣起反抗，使得大批執行「土改」的幹部遭受殺害。胡志明為平息民怨，斷然將長征的總書記職務解除，而由其本人以主席兼總書記；黎笋則以第一書記接掌黨的實權，至胡去世後，始擔任總書記而實行集體領導^⑩。

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明長征與黎笋對越共黨權的交替，乃為兩人相互輪流，不過了解越共內幕的人指出：長征當年的總書記職位遭到撤除，乃另有背景。由於越共在北越開府後，中共與蘇聯互爭領導權，克宮要求河內在經建上，須走工業建設路線；北平則力主河內須實行農業集體化，著重土改分田。當時長征是親中共派的巨頭，所屬行的農業集體化，顯然是對中共亦步亦趨，犯了蘇聯的大忌；而當時胡志明正意圖引蘇聯以平衡中共，乃以土改引起農民暴動為藉口，將長征的總書記撤除，而由其本人以主席兼任總書記，並將實權交由第一書記的黎笋接管，亦即由親蘇派頭領接掌越共實權。

從胡志明對長征與黎笋的更替安排，可想見當時中共對越共影響力之深遠，其間也含有剷除長征在越共內部的黨羽，以免引起內訌危機。此外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長征領導的土改遭到農民羣起反抗時，越共軍警均冷眼旁觀，沒有對土改幹部予以支援，一般多認定當時掌握軍警的國防部長武元甲，嫉視長征挾中共以自重，從而落井下石。武元甲被譽為軍事天才，惟到了黎笋向蘇聯一面倒時，他由於在越共高幹之中為「民族派」巨頭，反對因倒向蘇聯而開罪中共，遂被排出領導階層^⑪。

若問當年被指為親中共派首領的長征，現在何以能由國會常委會主席，接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又一躍而為黨的總書記？此不僅由於他在越共採取遠北平而親莫斯科路線時，與黎笋派站在同一立場，而且此次接任總書記，亦得到了克宮主人的首肯。蓋黎笋於七月十日病故，阮基石即於十二日抵達莫斯科，而越共中全會則於十四日選舉長征接替總書記職位，可見蘇聯早已屬意於他^⑫。

註⑩ 「長征路線強硬——當年土改處決五萬人」，香港《星島日報》——引載美聯社曼谷電，一九八六、七、十五，二版。

註⑪ 同註④。

註⑫ 「長征上臺後的印支局勢」，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五，第二版，社論。

(四) 長征迎合經改派早在黎笋病故之前

不過越南當前面臨嚴重而迫切的難題，乃為如何改革經濟政策，俾使嗷嗷待哺的人民，不致長期啼飢號寒。長征接任總書記並仍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固然是集黨政權力於一身；然而面對經濟狀況的江河日下，他還是依照黨內領導層四分之三的老派，堅持中央集權統制經濟，抑或接納新派的地方分權主張，對經貿作有限度的開放，俾能像南越所試行的「五合一」經濟制度，使死寂的經貿得到生機？

長征對越共新舊兩派經改爭執的立場，從他接任總書記後於七月廿六日在黨幹部會議席上的演說，即可窺見大端。他對經濟管理不善及去年底實行的財政改革，提出了批評，並稱構成黨的基礎的人民，必須使其具有「信心」。這無異說明由於經濟的處理不當，導致人民對黨的信心危機。因此他號召廢除或改正阻礙生產、對日常生活造成困難的政策，且譴責引起生產下降和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在抨擊黨的經濟管理部門的同時，還呼籲努力團結以加強黨的領導^⑬。

這項演說，表明了長征上臺後，他的著眼點乃在於改革經濟政策以增加生產，一方面迎合新派的經改主張；另一方面且也暗示已獲得舊派巨頭的同意，今年六月廿一日，也是在黎笋病故以前的二十天，越共中全會閉幕後，曾由政治局委員會決定對政府人事大肆更動，其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的素友革職，由政治局委員武志功接替；財政部長朱三武解職，接替者為食品工業部長武光；此外被解職的部長，還有內貿部、外貿部、交通運輸部、礦業和煤炭部、文化部各部長及中央銀行董事長^⑭。

越共六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府人事如此大幅度的革新，而且有關更動又以財經部門主管較多，實即在為長征當權後改革經濟制度的工作鋪路，觀察家都認為當黎笋因健康關係而難以力疾從公時，其大權已落入長征掌握，更顯示這位越共新首腦在尚未接任總書記之前，即已與主張經改的新派取得協調，始能由中全會作成決議，將有關部會首長大幅更新，再者，在越共六中全會為期十九天的集會中，黎笋雖健康不佳，但仍扶病出席，並且主持了閉幕典禮，發表訓詞，可見此一人事上的走馬換將，已獲得他的同情，亦即表明與黎笋沆瀣一氣的越共舊派黨人，都願意對僵化的統制經濟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

(五) 改革經濟已成越共的迫切問題

越南的經濟改革，可謂經緯萬端，且更牽涉到軍事及外交等諸般問題。越共在統治北越期間，於一九五六年實行第一個五年

註⑬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七、廿七，二版，引載法新社河內廿六日電。

註⑭ 越南政府大改組，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六、廿二，二版，引載法新社河內廿六日電。

計劃，至一九六一年，由於越戰已開戰端，第二個五年計劃遂胎死腹中，一九七五年，席捲南越後，第二個五年計劃始於七六年付諸實施，預定目標為：國民生產總額增加百分之十四、十五；農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八、十；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十六、十八；但結果各項預期都未達成目標，鑒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失敗的教訓，越共遂將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八五）平均每年的增長率抑低，計農業為百分之六、七；工業為百分四、五，實施的結果，一九八二年產糧一千六百廿五萬噸，一九八三年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噸，可以自給自足。

一九八五年，越共遂宣佈要增加農業生產百分之七點八；工業生產百分之八點七，俾消除日用品缺乏情形，並將糧產目標增至一千九百萬噸。惟其結果，糧產收穫僅有一千八百廿萬噸，比預定的目標，相差八十萬噸。河內將此歸究於颱風為災，其實水利失修，化肥及人力均感不足，都是因素之一端。越南在兵員方面，乃世界第三足兵的國家，但論及足食，則排入最貧困國家之林。共產國家的經濟，固然大都落後，但越南在共黨統治下，其經濟情況更糟，據西方分析家指出：其國民平均每人每年所得，僅相當於一百五十美元^⑤。

要改善越南的經濟而使其起飛，並非如越共領導層中的新派所力主的仿效南越地區實施的「五合一」經濟措施所能達成，而須從根本上將人力資源由戰場納入生產線，並爭取自由國家的大量資金與技術投注，方可奏效。因此越共領導層的青年派所倡導的經改企劃，勢必牽涉到「和」「戰」及外交路線問題，也會遭到共黨馬列派對修正與走資路線的攻擊。不過對「蘇修」抨擊得最激烈的中共，而今其本身所採的修正路線較「蘇修」尤有過之，東歐附庸國家的經貿情形之所以略有好轉，也是從修正路線而來。

越共高階層的老派，雖明知其經濟政策已面臨不得不捨舊從新的轉捩關頭，但又顧慮到欲為生產而爭取人力資源，便只有捨棄贖武路線，亦即將侵棉併寮的遠征重兵及陳列於中越邊陲以防禦中共進攻越北的師干，大部份裁撤而讓官兵解甲歸田，從事生產。這樣一來，當年胡志明所構想的「印支聯邦」計劃，便將落空。處此兩難之下，老派就只有推選七九高齡的長征接替黎笋出任總書記。長征在就任之前，即將政府部會首長大肆更新，且以財經主管居多；及就任之初，又強調經濟必須改革，俾爭回人民對共黨的信心，可見他的經改立場已與新派先有默契；但在經改企劃上，斷不致捐棄吞併棉、寮的前功。長征在越共中全會特別會議選舉中，能夠得到一致投票通過，可以顯示出新舊兩派對他的一致支持^⑥。

註⑤ ▲越追隨蘇擴張政策經濟大受影響▼，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九，二版社論。

註⑥ ▲長征任越共總書記……▼，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五，二版，引載法新社河內十四日電。

(六) 克宮屬意於長征接替黎笋遺缺的居心

若問克宮主人何以亦屬意於長征接替黎笋所遺留下的總書記權位？須知越共於南北越統一後，在對外政策上，原有引入美國勢力，以制衡蘇聯與中共勢力的企圖。而美國代表季辛吉與越共代表黎德壽，在於巴黎談判越南停火協定時，曾承諾華府將於戰爭結束後，畀予印支三邦四十億美元，援助各國復興建設，越南可獲得其中的卅二億美元。其後，蘇聯支使越共軍席捲南越，將「巴黎協定」毀棄，雖然具有使越共與美國無法化敵為友的企圖；唯越共則認為美國對越政策，亦着重在此留存其勢力，越共統一越南後，再與華府建交，既仍可獲得季辛吉所承諾的復興建設援款，且可引美國以平衡中蘇共對河內領導權之爭端，並進而使越南能在外策上效法東歐的南、羅，採取獨立的外交路線。

至南北越統一之初，美越在巴黎即開始建交會談，顯示越共對與美國的建交估計，並非一廂情願。在巴黎經過相當長期的談判，最後只剩下美方援越款項的名義問題，未獲解決。華府堅持不能用戰爭賠償，而必須名為戰後重建援助，越南對此亦頗有讓步之意，但此時適值美國與中共建交前夕，華府為免節外生枝，乃斷然宣佈停止與越南建交會談。這才迫使越南與蘇聯訂結「友好互助條約」，參加東歐國家的「經助會」，一面倒向蘇聯，並接受蘇援，出兵侵棉併寮，不惜與中共反目成讎。尤其重要的是越南在南征高棉北拒中共的兩面受敵情勢下，甘讓游弋於東京灣的蘇聯艦隊進踞金蘭灣^①，引起東南亞戰略形勢的重大變化。

蘇聯斷不容越南在外交上琵琶別抱，而事實上，越共領導層青年派為解除經濟上的困境，有意開拓經貿，引入自由國家資金及技術，且更有意趨向南、羅的獨立外交路線，招致蘇聯的疑慮。此外，棉人抗越三邊聯合政府已提出了與越南和平的八點建議，主旨在要求侵棉越軍分兩期撤出棉境，俾與河內訂結互不侵犯條約，並使金邊政權加入聯合政府由三邊變為四邊聯合。北平與「東協」國家既都贊同此項建議，而河內雖已斷然拒絕，但對美國總統雷根所表明的美越建交兩大前題——(1)河內必須協助美國尋找在印支失蹤美軍的下落，(2)侵棉越軍必須全部撤離，却未堅決反對，且曾歡迎美國官方與民間派員在越展開尋找工作，並曾接受美國工商界代表團百餘人的訪問，這些都可視為美越建交的先奏曲^②，克宮又安能不為此擔憂？

很顯然，越共領導層新派的經改企劃，勢在必行，而美國前在巴黎所許諾的鉅額援款，更屬越共從事經改所必需，一旦美越建交，美國的資金及科技自可源源而來，蘇聯又豈肯將此一在東南亞的前進基地與美國平分。況且中共已乘機向河內提出正式建

註① 越南要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臺北《國際現勢週刊》第一五二期，一九八五、四、廿九日版，譯載合衆國際社特稿。

註② 东盟支持民柬八點建議促越從東撤軍，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六、廿五，三版。

議，如果越南將侵棉越軍全部撤離，北平即可界予河內巨額援款^⑩，作為建設用途。倘果如此，則中越共又可重拾舊歡。克宮為阻止越共的經改及其在外交上的易轍改轍，便只有使堅持贖武主義的長征出而掌舵，因為在他的領導之下，越共雖然可能進行有限度的經改，但斷不會放棄併吞棉、寮的目標，並且仍然保持一面倒的親蘇外交。

(七) 長征奉召訪蘇商討的主題

長征於七月中旬接任越共總書記後，席不暇暖，即於七月廿八日奉召赴莫斯科，並於八月十二日朝見克宮主人戈巴契夫討論越南諸般問題。雙方商談內容雖未透露，但對越共今後的作為，包括如何改善經濟以及經改不容牽涉到外策的改弦更張等問題，自在意料之中。不過當前越南的經濟改革，固然不能突破馬列主義統制經濟的框框，惟其所需外國資金科技以及人力資源問題，必須速謀解決之道。就蘇聯對越的援款而言，雖每年高達約十億美元，惟由於軍精浩繁，能用於經建上的則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戈巴契夫為支援越共經改，能否在每年十億美元援款之外再予增加？蘇聯本身因石油減產及油價下跌，致使外匯收入銳減，估計所能增加的援款亦極有限^⑪。

實際上，越共經改所需外國的經技投注，並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援助，而須仰仗自由國家工商界的投資設廠，藉作科技轉移，例如美國在「東協」國家的投資總額，到目前已超過一千億美元，上年的貿易總額，已達二百卅五億美元^⑫。「東協」國家的經建突飛猛晉，乃由此而來。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除政府援助而外，便不能再有民間的投資，越共策劃經改，又安能不寄望於與自由國家溝通。上年底，美國工商代表百餘人訪越，得到了河內的熱切歡迎，顯示美越雙方對貿易的開拓都有殷切的期望。不知克宮主人與長征的商談，將如何約制越共的經改不致使其外交走向南、羅的獨立自由之途？

越南經建年年都不能達成指標的另一障礙，厥為人力資源大部份都耗費於戰場，以致造成生產線上人力不足，在七十年代之初，日本記者在北越經過相當長期訪問調查，發現男丁大都受召入營。在農業勞力中，婦女約佔百分之七十五；工業勞動，亦有百分之六十五由女性承擔，不僅教育及服務業都落在女子肩頭，連河仙及其他地區的防衛部隊亦多為女兵。到南北越統一後，大部份官兵多已解甲歸田，當時越共雖已大力號召向生產線進軍，以「建設熱」取代「戰征狂」；然而侵棉之戰又起，於是又將生

註⑩ 入越倫自來撤軍中共願予經援，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八、七，二版。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六、四、一，十一版。

產線上的人力驅上戰場。同時，侵棉之戰引起了中共的進兵越北，越共在南北兩面攻防戰中因兵力不敷支配，遂將先前的國防軍六十萬擴充為一百廿萬人馬，致使生產線上的人力資源益感不足。

人力資源有品質的高低，教育程度決定品質的高下，當然也含有民族傳統及天賦資質的成份，在越南居民之中，一向以華人品質較優，主持工商企業、從事工程師、醫師、會計師等自由職業以及勞工中的領袖，以華人居多即可證實此點。越共因與中共化友為敵，為清除北平在華人社會所佈建的第五縱隊，於是大量驅迫華人出境，越戰後在海上逃生的成千成萬越南難民之中，華人佔百分之九十，其中以科技人才居多。此又為越南生產線上人力資源的極大損失。越共從事經改，自無法排除如何與中共重拾舊歡，及自高棉撤軍，讓官兵解甲加入生產行列等的可能性。克宮主人與長征討論越南經改時，又將何以約制新派在進行經改的過程中，不致牽涉到這些犯了蘇聯及越共死硬派大忌的問題？

(八) 結 論

誠然，越共領導層的力主經改者，尙未計及將黎笋生前策定的親蘇黷武路線推翻，但克宮似已預估越共經改的發展，不會不對此一路線改弦易轍。在越共，經改既為大勢所趨，遏阻必將形成怒潮，便只有從中疏導，由越共領導層中的死硬派巨頭長征接替黎笋主黨，一方面堅持越共老派的贖武路線，吞棉併寮，實現「印支聯邦」的野心；一方面站在青年經改派的前頭，領導經改，但不許超越馬列主義的框框。

一般認為長征主持越共黨政，只時暫時過渡性質，至今年十二月越共第六屆黨代大會舉行時，他與范文同等年邁巨頭，都會宣告退休。屆時接棒的人，以七十一歲的阮文林及七十四歲的范雄成份居多。不過從經改的角度而言：在此不及半年的时间之中，千頭萬緒的經改工作，只可將計劃綱領提呈黨大會通過，至於在實施時，如何控制此一關乎國計民生的工作，使其不致超越克宮與長征約制的範圍，則似非新的接棒者所可能把握。

施亞努斷定黎笋逝世後，越共吞棉政策不會變更^②。然而美國既已表明與越南重建關係，將以越軍撤離高棉為兩大前題之一，「東協」國家與加、日、澳、紐及歐市各國亦同聲附會，中共更以此為與河內重修舊誼的前題；而聯大每屆集會，所有自由國家幾乎都贊同對越南侵棉予以經濟制裁，且以斷絕經援協助脅迫越軍全部撤離高棉。在此情勢之下，越共又將如何在拒絕棉人三邊政府八點和平方案的同时，達成經改派吸收外人經投資金投注的期望？因此，長征所面對的任務，可謂來日大難，惟當權的共產黨人，都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長征是否願意眼睜睜的將權位交予年輕人？當待事實證明。（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七、十一，二版。